

- 周红^a, 张彩霞^b (厦门大学 a. 图书馆, b. 台湾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走向平民——

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平民化历程

[关键词] 中国近代图书馆; 平民化; “开民智”; 社会教育; 新图书馆运动

[摘要] 平民化是近代图书馆的基本特征。产生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开民智”思潮背景下的中国近代图书馆, 随着社会各界对其社会教育功能的深刻认识, 最终被民国教育部定位为社会教育机构, 从而为图书馆的平民化提供了制度保障。20 世纪 20、30 年代“新图书馆运动”兴起, 它所传播的西方图书馆理念和美国式图书馆管理方式, 促使中国近代图书馆在服务形式、借阅对象、收费方式等管理方式上逐渐走向了平民化。

[中图分类号] G250; G259.29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14(2009)03-0091-04

产生于 20 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图书馆, 在建立之初由于受长期封建专制和古代藏书楼观念的影响, 无论从办馆思想抑或服务方式都留存有封建藏书楼的痕迹。随着 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新图书馆运动”的兴起, 中国的图书馆思想因受欧美图书馆管理思想的影响, 图书馆理念开始转向服务大众、服务平民, 中国近代图书馆也开始逐步走上了平民化的发展道路。直至 21 世纪的今天, 图书馆的平民化依然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主题。

1 平民化是近代图书馆制度的基本特征

世界范围内近代图书馆的建立是以公共图书馆的产生和发展为核心的, 是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而最终得以从欧美国家传播至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运动。国外公共图书馆理念的奠基人主要有英国图书馆学家帕尼兹和爱德华兹。其

中帕尼兹被人们称为“图书馆界的拿破仑”, 他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免费开放”图书馆和“平等利用”图书馆的思想。爱德华兹则提出了最早的“平民化图书馆”理念。继英国之后, 法国、德国、美国等欧美国家也逐渐进入近代图书馆运动的发展阶段, 美国的杜威则成为帕尼兹、爱德华兹之后在世界范围图书馆界有着重大影响的图书馆学家, 他在“平民化图书馆”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民的大学”的图书馆理念。“平民化图书馆”更多地强调对平民的公平、自由的开放, “人民的大学”则凸显了近代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但不管是“平民化图书馆”还是“人民的大学”都明确地表达了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平民化这一基本特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49 年发表的公共图书馆宣言曾明确指出: “公共图书馆应当随时都可让人到馆, 它的大门应当向社会上一切成员, 自由地、平等地开放, 而不管他们的种族、国籍、年龄、性别、宗教、语言、地位或教育程度。”^[1] 该宣言对图书馆的平民化做了最清晰地表述。

我国的近代图书馆制度从建立之初就深受国外图书馆理念的影响。在晚清西学东渐大潮推动下, 开始走上了近代图书馆的中国化之路。然而, 因受贵族化的古代藏书楼思想的影响, 中国近代图书馆从 20 世纪初建立, 直至 20 世纪 20 年代前, 图书馆理念依旧是“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 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 国外的“平民化”图书馆理念并未被很好地阐扬。沈祖荣在 1918 年 3 月公布“中国图书馆调查表”时就指出: “中国古代藏书, 属于公家者, 石渠金匱, 视若鸿宾, 人民无由窥其美富。在私家搜罗诸子百家, 侈谈宏富, 亦抵供一二学者研究高深之学理; 而于普通人民无与也。盖吾国士夫多持曹仓邺架之谬见, 尚未明障图书馆之性质, 不在培养一二学者, 而在教育千万国民, 不在考求精深

学理,而在普及国民教育。此中国图书馆不能发达之一原因也。”^[2] 作为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专家,沈祖荣先生认为我国古代藏书楼思想存在的弊端就是“供一二学者研究高深之学理,与普通人民无与也”,认为我国图书馆不发达的原因就是不明瞭近代图书馆的性质应该是“教育千万国民”“普及国民教育”。1921年,刘国钧先生的《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一文中认为近代图书馆的性质是“自动、社会化、平民化”,图书馆的平民化则是近代图书馆乃为多数人而设,而非为少数人者。“故其目的在使凡有阅读之能力者,不问其年龄阶级与性别之如何,皆得有适当之读物。苟年龄太幼不能诵读者,则为之备置图画。”^[3] 由此可见,是否具备平民化成为古代藏书楼与近代图书馆的本质区别,近代图书馆所关注者为图书利用之平民化,主张社会各阶层民众不分年龄性别、阶级和地位,均享有平等使用图书馆之权利。“自有图书馆以来,追求对所有民众公平和自由的图书馆服务,一直是图书馆的重要主题,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会如此。”^[4] 这些论述都指出图书馆的平民化是近代图书馆的基本特征。

2 “开民智”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平民化的思想渊源

鸦片战争后早期维新派就对西方图书馆“开民智”的社会教育功能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开始了对近代图书馆最初的介绍和宣传。甲午战争的失败更是让当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志士深刻地意识到国民素质的低下是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并开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救国药方,而建立类似于欧美国家的新式图书馆就是其中的一剂。康有为认为,“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5] 梁启超则指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6] 严复在《原强》中认为:“民智者富强之原,此悬诸日月不刊之论也。”^[7] “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8] 正是基于对“民智”低下的深刻认识,早在1895年甲午战败后,在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中就提到西方的图书馆是其国家发达的重要原因,称:“其每岁著书,美国乃至万余种,其属郡县,各有书藏,英国乃至百余万册,所以开民智者亦广矣。”^[9] 呼吁中国向西方各国学习,建立供广大民众“以广见闻”的藏书楼,以启迪民智。在清末知识界“开民智”的教育救国思潮影响下,晚清政府在清末新政时期对文化教育进行了系列改革,建立新式图书馆成为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据不完全统计,1905

年至1911年间,成立的我国公私立新型图书馆约有26所。^[9] 中国近代图书馆正是以“开民智”为契机,开始了平民化的最初旅程。

3 民初教育部将图书馆定位为教育机构为其平民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民国以后,被寄予“开民智”厚望的近代图书馆,其社会教育功能越发得到时人的认识。“图书馆在教育上占重要之位置,已允为各国教育家所公认。就社会教育上说,图书的效果其最著者,当推国民图书馆”。^[10] 李蒸认为,图书馆可以辅助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可以普及教育、改造教育,“民众图书馆的教育,亦为改造途径之一”。^[11] 社会教育研究人员陈友松和刘伍夫认为,“图书馆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教育的机关”。^[12] 蔡元培指出:“教育并不专在学校,学校以外,还有许多的机关,第一是图书馆。”^[13] 李大钊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他认为:“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和社会教育更有关系。”傅葆琛认为:“民众图书馆是一种社会教育的机关,也是一个社会式民众教育机关。”^[14] 由此可见,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已成为民初社会各界人士的共识。

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除了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舆论宣导外,民初教育部对其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的定位则在制度上保障了其社会教育功能的实施。公共图书馆建立之初由学部职掌,其图书馆观念为“以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2] 源于“开民智”思潮而建立的新式图书馆却并未真正面向普通民众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民国以后,教育部各种有关图书馆的法规才开始明确了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的平民化定位。自此,图书馆作为实施社会通俗教育的文化机构,其服务广大民众的平民化定位最终使得图书馆在社会上的位置也为之一变。“以前图书馆的出发点在图书,以图书为对象,分类项目流通典藏。现在一切社会事业,以民众为对象,改良社会,改良民众。图书馆之变化,这是中国近代图书史上一个重大的转变”。^[15]

4 民国时期“新图书馆运动”与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平民化

“新图书馆运动”作为近代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历史意义已经得到图书馆界的广泛认同,虽然在其起始日期的界定上存在不同观点。^[16] “新图书馆运动”的中心任务是宣扬美国式的图书馆管理方式,传播西方近代图书馆理念。“新图书馆运动”通过实现图书馆服务形式的多样

化,服务对象的普遍化,从收费走向免费服务等途径,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平民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新图书馆运动”大力宣传西方“平民化图书馆”和“人民的大学”的图书馆理念,从而对图书馆的发展起到思想启蒙作用。因此,为了更好地使图书馆发挥“人民的大学”的社会教育功能,民国时期出现了通俗图书馆、民众图书馆、公众图书馆、巡回文库等更贴近普通民众的服务形式。所谓通俗图书馆,主要指那些推广通俗教育的图书馆,倾向于为下层民众服务。一些通俗图书馆还设有专门的儿童阅览室、女子阅览室,有的还设有分馆和巡回文库。巡回文库是通俗教育的一种,由各县设立通俗文库总部,“采集人民必需而易晓之各种图书(如最简单之世界图、本国图及本省本县等图;书如各种有益小说及新闻杂志、自治法令等项)输送城镇乡各支部转送各村落阅览所,限定日期阅毕,由处送回总部收存”。^{[2]257-258}采用巡回文库既是提高图书利用率又是将图书贴近最广大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村民众的最好的方法。马宗荣认为“现世的图书馆于本馆外,别设分馆,图书流通处,图书代借处;办理巡回文库等。于是距图书馆较远的民众和不能离家的老年人、产妇等,也得沾图书馆的恩惠了”。^{[10]18}191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报统计:全国21个省有省图书馆23所,公私立通俗图书馆237所,巡回文库30个,公众阅报所京师9个,各省公私阅报所共计1808所。藏书70100部,每日平均阅览人数7984人,且以湖北、山东、河南、奉天等省的藏书和读者为最多。^[17]通俗图书馆、巡回文库、阅报所等不同图书馆服务形式的出现,使图书馆的服务进一步贴近平民大众。

随着图书馆多种服务形式的出现以及西方“平民化的图书馆”理念的传播,图书馆的借阅对象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普通民众开始成为图书馆的主要服务对象。古代藏书楼只有少数人可以鉴赏,“但非士夫官吏,即不得享其权利;虽积学之士,苟无势力,亦不得入其门。盖专制时代,阶级观念深刻,限制之事,在所不免耳”。^[18]清末民初,图书馆逐渐公开,不再为贵族阶级所独享。但此时的图书馆还谈不上为社会大众所共享,知识阶层是最主要的利用者。民国以来,公共图书馆阅览者扩大到政、学、军、警各界人士,商人和工人较少。新文化运动时期,众多知识分子认为图书馆功能在于普及国民教育,主张向全民开放。《中华图书馆协会概况》一文中指出:近世图书馆功在致用,其鹄的在使国族无男女老稚以逮聋

哑,读书机会一切均等。^[19]李小缘在《藏书楼与公共图书馆》中写道:“人人皆有资格为读者。皮匠、铁匠、小工、瓦匠、木工、学生、住家的、有钱的、无钱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没有界限,一齐欢迎。”^[20]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规定公立图书馆向全民开放,阅览之士,无阶级之限制,无年龄之约束,人数务求众多,权利务求普遍,与昔日藏书楼有天壤之别。

走向免费服务是近代图书馆走向平民化的重要前提。“新图书馆运动”期间,图书馆界人士大力宣传和极力促成图书馆的免费服务,最终使我国近代图书馆从收费服务逐步过渡到免费服务。清末民初是我国近代图书馆建立的第一个高潮期,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大多实行收费制度,且认为收费本是合理之举。其收费方式主要为出售“观书券”,出售“观书券”所得的费用,时称“券费”或“券资”。直至1918年3月,沈祖荣在《教育公报》公布“中国图书馆调查表”,^{[2]187-196}我们仍可看到图书馆较为普遍存在的收费现象。在该调查表中所涉及的36所图书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学校图书馆,一种为普通图书馆,前者15所,后者21所。在15所学校图书馆中,除两所未表明是否取资外,仅南通学校图书馆每券铜元2枚,其他均不取资,收费图书馆比例为6%。在21所普通图书馆中,7所为“阅书证券不取资”或“不取资”“不取分文”外,4所未明确,剩余10所均不同程度收取费用,收费图书馆比例为48%。沈祖荣为此得出结论:欧美国民,视图书馆为继续终身之教育机关,如日用之布帛菽粱,不可须臾离者。故平日好书人多,阅书人数,不可胜计。中国阅书人少,人民求学之心力薄弱,无容讳言。然各图书馆证券取资,亦足阻碍来学之心。观表内凡取资之图书馆,阅书人数较少,可为明证。盖图书馆为公共求学之所,应持开放主义,不取分文以资提倡。欧美图书馆,无一取资者,日本公共图书馆亦然。故阅书人纷至沓来,倍形踊跃。中国仿而行之,沟诱导人民阅书之良法。况取有限之资财,生极大之障碍,所得亦不偿所失。^{[2]196}然而,相比清末民初时期绝大多数图书馆对读者收费,已经是有所进步了。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新图书馆运动”的兴起,公共、公开、共享的“平民化图书馆”“人民的大学”的近代图书馆观念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认识,社会舆论强烈呼吁公共图书馆尽快向公众免费开放。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其存在的1921年至1926年间召开的4次年会中,有2次通过

免除券费议决案,其推动作用功不可没。到上世纪30年代,全国的公共图书馆都先后实行了免费服务。

“新图书馆运动”展开后,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迅速。到1928年,除甘肃等7省区、汉口及东省^①行政区外,全国共有图书馆557所;1929年全国有图书馆1131所,1930年为1428所。^[21]据许晚成统计,1931年全国图书馆共有2953所,经费为987423元,职员为3528人,性质可分普通、专门、民众、社教机关、公司官署、团体附设图书馆、书报处及巡回文库、大中小学、私家藏书楼。^[22]“近数十年来,人文愈著,民智益启,而策府艺林,遂随时代以俱进,辞尚方而入闾巷,去岩穴而赴闹市,盖已由贵族而平民,由特殊而普通,由珍玩而实用,由储藏而公开”。^[23]时人的评论正充分地说明了我国近代图书馆在经历“新图书馆运动”后,最终走上了“由贵族而平民”“由特殊而普通”的平民化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 [1] 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科教处. 世界图书馆事业资料汇编 [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0: 45.
- [2] 李希泌, 张椒华.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3] 刘国钧. 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 [C]// 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21: 2.
- [4] 刘兹恒, 余训培. “新图书馆运动”的精神实质——对图书馆“民众”概念的回顾和反思 [J]. 图书馆, 2005 (5): 1—4.
- [5] 汤志均. 康有为政论集 上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169.
- [6] 石峻. 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57: 391.
- [7] 翦伯赞. 戊戌变法 [G]//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三.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56.
- [8] 翦伯赞. 戊戌变法 [G]//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148—149.
- [9] 张锦郎, 黄渊泉. 中国近六十年来图书馆事业大事记 [Z].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4: 28.
- [10] 马宗荣. 现代图书馆 [C]. 上海: 中华学艺社, 1928: 1.
- [11] 李蒸. 最近一年之社会教育 [J]. 民众与教育, 1933 (5): 19.
- [12] 陈友松, 刘伍夫. 图书馆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1.
- [13] 高平叔. 何为文化 [M] // 蔡元培. 教育论著选.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68.
- [14] 陈侠, 傅启群. 我们对于民众学校的新主张 [M] // 傅葆琛教育论著选.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104.
- [15] 杜定友. 图书馆与成人教育 [C]. 上海: 中华书局, 1933: 158—161.
- [16] 吴稼年. “新图书馆运动”若干关键点之研究 [J]. 图书馆, 2006 (6): 27—30.
- [17] 陈源蒸, 张树华, 毕世栋. 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 (1840—2000) [C].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22.
- [18] 金敏甫. 中国现代图书馆概况 [Z]. 广州: 广州图书馆协会, 1929: 7.
- [19] 中华图书馆协会. 中华图书馆协会概况 [Z]. 北平: 中华图书馆学会事务所, 1933: 26.
- [20] 李小缘. 全国图书馆计划书 [J]. 图书馆学季刊, 1927, 2 (3): 19.
- [21] 邹华亭. 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 [Z].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61—64.
- [22] 许晚成. 全国图书馆调查录·黄警顽序 [M]. 上海: 龙文书店, 1935: 2.
- [23] 董铸仁. 图书馆与读众 [J]. 文华图书馆学科学季刊, 1931, 3 (4): 44.

【作者简介】周红, 女,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厦门大学图书馆采访部主任; 张彩霞 (1975—), 女, 历史学博士,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

【收稿日期】2008—04—22 【责任编辑】马立群

^①1922年11月成立东省特别行政区, 下辖区域包括哈尔滨, 东至绥芬河, 西至满州里, 南至宽城子。1933年7月1日后改称“北满特别区”, 1935年12月北满特别区撤销。